

土耳其经济模式变革与伊斯兰复兴运动*

李艳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伊斯兰世界蔚然兴起,并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因此,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经济现代化历程——经济模式变革不无关系。尽管发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变迁轨迹各异,但它们都将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土耳其为个案,通过探讨经济模式变革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来阐释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辩证关系。

一

20世纪以来,部分国家为了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发展政策,将与国家命脉关系密切的经济资源收归国有,通过经济强制来捍卫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便是中东地区在这方面的代表。就土耳其而言,新生的凯末尔政权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同时,在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国家主义政策。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扶植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加速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长期并存和相得益彰。1935年,凯末尔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由土耳其本身需要促成的,是一种特有的制度。……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以应付一个很大国家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需求……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某些尚未由私人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我们选择遵循的道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① 国家主义是一党制和凯末尔威权政治在经济领域的延

伸和表现,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又为一党制和威权政治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伊斯兰主义者慑于国家的威权处于蛰伏状态。但当威权政治趋于弱化时,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就随之发生变化。

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土耳其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逐渐松动。随着开放关税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经济呈现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但并没有超越国家主义的范畴。从1963年起,土耳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采用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仍然比较严格,经济结构中国营的比重仍较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增加,境外劳工向国内的汇款以及欧洲货币市场短期资本的流入,使得土耳其在解决外汇短缺、保持经济增长率方面成效显著。但是,由于经济过于依赖进口,亟需原材料、半成品和资本货物,而且用于支付进口的外汇数额受到有限的出口创汇能力制约,土耳其经济易受内部和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70年代后期,政局动荡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使土耳其经济一度陷入困境:通货恶性膨胀、外汇枯竭、对外支付发生危机。经济危机使伊斯兰极端思想在下层民众中间颇受欢迎,所以伊斯兰主义者在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发动暴力斗争,直接导致军方发动1980年政变。

政变后上台的厄扎尔政府出于稳定经济的需

*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伊斯兰视域中的宗教对话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YJC73000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① [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11页。

要,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改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1982年宪法保障私人所有制不受侵犯,规定国有企业的活动不应该破坏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1983—1984年,土耳其通过一系列法律支持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和出租给私有公司经营,允许国营公司发行营利股票,国家设立专业银行信贷机构——社会股份基金,通过鼓励居民积极储蓄为國家的基础建设(如修路、桥梁和大型发电站等)筹备资金。1984年1月,厄扎尔政府通过了鼓励出口的决议,规定了出口企业的优惠税率、低息贷款(为正常贷款利息的一半),出口单位获得可以购买用于偿还总数为50%的优惠外汇以及用于购买生产出口产品的先进国外设备所必需的外汇,那些最大的出口企业(年出口总额达3000万美元以上)还享有进口商品的特权。到80年代中期,土耳其经济平稳增长,出口增长很快。^①这样,土耳其经济逐渐从国家控制的保护主义经济模式向准市场经济过渡,但是实行经济自由化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许多人陷入贫困境地。人们对经济的不满使伊斯兰经济获得较大市场,部分失业的工人和边缘化的小企业家对倡导正义秩序的伊斯兰政党颇有好感,部分在经济自由化中被边缘化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将目光投向伊斯兰经济联合体和伊斯兰政党。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经济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通货膨胀率经常保持在100%左右,进出口不断恶化,2000年全年的赤字超过100亿美元;作为农业大国却时常出现面包和黄油乃至烟草、食糖短缺的情形;旅游业又因恐怖活动造成收入锐减,其他行业亦在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和经济紧缩政策的双重压力下日趋低迷,雪上加霜的是连续两次大地震对经济产生了破坏性冲击。经济的颓势引发投资者和民众对政府及其驾驭经济能力的不信任,信心的丧失又反作用于经济,进一步造成经济低迷的恶性循环。另外,国家高度保护的金融市场也存在垄断集中、效率低下的痼疾,造成外资和其他资金进入门槛的提高,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迟滞等。虽

然到2000年,金融市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但是仍不能从根本上完善金融体制,国有银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严重。而部分被市场淘汰的金融机构则在政府或明或暗的补助下得以喘息,市场结构被大大扭曲,金融市场总体抗风险能力极弱。2000年末,土耳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左右翼政党,得以单独执政并蝉联至今。

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为完善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潮流,一方面强调市场利益,沿着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方向改革国家,主张社会正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稳定和机构改革政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定,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迅速,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到2004年中期,土耳其银行和金融制度远好于以前。^②除了在宏观经济领域的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还对腐败问题采取重拳出击的政策,不仅赢得了较高的民众支持率,而且获得更多中小企业家的经济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变革一方面凸显了传统伊斯兰主义者全新的经济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经济政策方面与世俗政党并没有根本区别,同时也证明经济模式变革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变迁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二

经济模式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高涨与转化。

首先,催生了变革过程中的失利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导致他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慰藉,也使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日益扩大。经济模式变革一方面促使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166.

^② Ziya Öniş,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p.207—234.

进程加快,另一方面造成土耳其传统经济结构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许多下层民众失去对执政当局的信任,转而支持倡导社会正义的伊斯兰主义者。米尔顿·英格(Milton Yinger)生动地描述了土耳其民众的这种心态:“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希望与现实之间的位差,所以各地人便试图用一种信仰的飞跃来弥合这一位差……按照这种说法,宗教可以被视为一种剩余的应付或调整手段。宗教可尝试用来解释其他手段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用来获得我们最终寄予希望的力量……”^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模式的变革使土耳其城市化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1960年,土耳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2%;1980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到1990年,有5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②随着城市化运动的推进,农民逐渐改变边缘化处境而成为重要的社会参与力量。这些新涌入城市的农民大多居住在城市四周的棚户区,并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福利与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意识到城市服务、健康教育、工资体系、就业规划等并没有将他们考虑进去,于是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而且,这些居住在棚户区的农村移民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于是他们纷纷从伊斯兰文化中寻找情感慰藉,凭借穆斯林皆兄弟的认同来构筑彼此之间的依附感。这些新的城市居民“在城市里与大批陌生人相互接触,面对新的社会关系,他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来指导他们的生活。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正好满足了这些需要”。^③随着土耳其社会整合速度的加快,城市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崩溃,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这一切为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极端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麦赫迈特(Mehmet)指出:“伊斯兰复兴是民众对未实现的期望的一种回应。”^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乡村和城市的发展重新塑造了土耳其的政治环境,为民众政治的崛起创造了良好条件。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经历了从边缘乡村到大城市的扩大过程,早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乡村。20

世纪70年代,伊斯兰政党以及苏非教团的支持者大都聚居在凯末尔主义并未触及、传统文化依然浓厚的农村地区,所以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带有极端狂热的倾向。随着土耳其经济模式的改变,市场经济也影响到农村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导致部分民众迁移到城市,建立其实业资本,成为伊斯兰精英。为了壮大他们的力量,这些伊斯兰精英通过向学生提供食物、奖学金、宿舍以及就业指导、推荐工作的机会,将部分青年人纳入自己的阵营,而这些年轻人则成为此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力量的主体。坚守传统纽带的伊斯兰精英还团结了部分下层民众,由于经济模式变革过程使得部分产业工人失业,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小生产者的经营步履维艰,小公司或破产或被大公司兼并,于是伊斯兰精英就借助伊斯兰文化纽带来团结他们,这就使得倡导伊斯兰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伊斯兰政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繁荣党提出保护中小资本利益群体以反对基于自由贸易经济的全球化战略,指责腐败的国家战略制定者,提出旨在提高穷人物质地位的社会正义思想,使其在1995年大选中获得21.38%的支持率而得以主导联合政府。与民族拯救党主要获得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乡村民众的支持不同,繁荣党在土耳其最大的两个城市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获得绝对胜利。所以说,经济模式变革催生了在变革中失利的部分民众的不满,从而使倡导公平正义、民主道德、人权平等的伊斯兰政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完善,乡村和城市下层民众的社会处境有了很大改善,而以正义与发展党为代表的新型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广大,除了获得安那托利亚乡村居民、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等传统阶层的支持之外,还获

① Milton Yinge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The Micmillian Company, 1970, p.8.

② Haldun Gulalp,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slam: The Social Base of Turkey's Welfare Pa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3, No.3, August 2001, p.441.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④ O. Mehmet, *Islamic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Studies of the Islamic Periphe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42.

得了新兴的较为虔诚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2007年大选中,有许多家境富有同时又比较虔诚的新兴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正义与发展党摇旗呐喊。支持者既有从国家福利中获得好处的社会底层人民,也有从经济发展中富裕起来的商业中产阶级,正义和发展党在土耳其第一次发展成为类似于德国基民盟或社民党这样的大众政党。因而,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过程中,被凯末尔改革排斥在权力之外的社会阶层逐渐被纳入现代政治体系之中,他们通过各种正当或非正当的途径争取权利和角逐政权,“如果说地位衍生于政治影响、经济财富或智力声望的话,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他们在土耳其社会的等级机构中寻求一席之地而努力过程”。^①所以说伊斯兰政党的主导话语从正义秩序转变为正义发展,既体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自身的调适与进步,又说明了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其次,促进了伊斯兰经济实体的兴起。伊斯兰经济实体作为政治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支持者,通过与国家主导的大工业竞争来寻求生存空间,从而推动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经济模式变革和新的社会阶层出现过程。凯末尔通过世俗化改革实现了权力重构和国家重组,并培养出服务于新生国家发展需要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下,这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财富,这引起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多党民主制启动之后,民主党联合下层民众和农民将执政了20多年的共和人民党赶下台,为了取悦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民,民主党在执政后期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限制,伊斯兰教随之在文化领域兴起。随着经济模式的变革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安纳托利亚地区逐渐形成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这个新社会阶层借助宗教群体表达自己的政见,以增加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不过在国家主义和进口替代经济模式下,他们并没有发展壮大起来。

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土耳其涌现出一批新商业精英。他们大都出生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乡镇,父辈大多是小店主、小商人、农业资本家和公

务员,他们通过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些新商业精英保留着浓厚的地区认同,秉持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文化观念,有学者将他们称为“安纳托利亚之狮”,将他们与源自大城市的、坚守凯末尔主义的商业精英区别开来。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的施政纲领对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企业主给予经济支持和政策倾斜,使他们成为国家官僚在经济领域的代言人,这种特权地位引起了新兴商业精英的不满。20世纪80年代,新兴商业精英纷纷成立中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公司号称“安那托里亚之虎”。他们组成独立工商业联合会(MUSIAD)^②,以争取相应的权益,抗衡由凯末尔主义者商业精英控制的大企业组成的“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TUSIAD)^③。独立工商业联合会明确表示,要保护欠发达地区小企业的利益,主张自由贸易;将伊斯兰教作为所有成员协作和统一的基础,因为伊斯兰教是创建安全市场和投资来源的重要途径。独立工商业联合会经常组织研讨会和发行期刊,发布技术和与市场相关的信息,组织国家贸易博览会,建立与外国的进出口联系,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组织诸如外语、现代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培养成员间的团结意识,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网络。^④独立工商业联合会要求其成员在不牺牲伊斯兰道德的前提下尽一切努力参与市场经济,代表了新兴边缘化商业阶层的利益,体现了它们联合起来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信心和勇气。作为支持伊斯

^① Binnaz Toprak,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in Turkey", in Cigdem Balim, Ersin Kalaycioglu, Cevat Karatas, Gareth Winrow, Feroz Yasamee Eds., *Turkey: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the 1990s*, E. J. Brill, 1995, p.95.

^② 土耳其独立工商业联合会由虔诚的伊斯兰商人埃洛勒·亚拉(Erol Yerar)筹建成立于1990年5月,主要由源于安那托利亚的中小企业组成,亚拉担任联合会主席至1999年5月,此后由阿里·拜拉谟鲁(Ali Bayramolu)接任主席一职。独立工商业联合会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M,通常被视为代表“Muslim”而非“mustakil”(独立)。

^③ 土耳其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71年,主要由以伊斯坦布尔为大本营的约300家大公司组成,是土耳其大企业构成的联合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④ Haldun Gulalp,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Islam: The Social Base of Turkey's Welfare Pa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3, No.3, August 2001, p.439.

兰复兴的经济组织,尽管独立工商业联合会与伊斯兰政党并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但其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伊斯兰政党参加竞选,不仅为伊斯兰政党的选举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而且影响了执政的伊斯兰政党的文化和宗教政策。

由于独立工商业联合会也将市场经济作为追求的目标,融入世界市场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也是其终极追求,所以当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趋于成熟时,工商业联合会和独立工商业联合会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在1997年软政变之后与各个政党保持一定距离,然而该组织的主导思想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纲领相似,因此它完全支持正义与发展党的民主和秩序的纲领。在全球化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出现重新洗牌的现象,独立工商业联合会和工商业联合会也出现交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随着经济模式的日渐成熟,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主导话语、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最后,影响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斗争方式,促使伊斯兰政党对其政治纲领作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国家主义政策盛行的党国合一时代,凯末尔威权政治限制了民众的自由选择,对宗教的利用和压制导致处于地下状态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夹缝中苟延残喘。尽管部分苏非教团为了生存的需求发动了对凯末尔政权的抗争,甚至一度发生“麦纳麦事件”^①,却未能对世俗主义和威权政治产生多大影响。随着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遭遇危机,严格的世俗化政策逐渐松动,苏非教团和新苏非主义运动——努尔库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它们作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在边远地区从事伊斯兰教育活动。

20世纪50年代,为了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率,民主党政府频频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恢复使用阿拉伯语宣礼、修缮和修建清真寺、扩建伊玛目—哈提普学校,最终导致1960年政变的发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模式的实施,使土耳其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埃尔巴坎所倡导的民族观运动迅速获得民众的支持。埃尔巴坎指出,伊斯兰政党的主要目标是复兴道德价值和卓越精神(其在当时的土耳其社会中处于休眠状态),以使土耳其

实现和平秩序与社会正义;^②他主张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建立伊斯兰共同市场;反对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否则拥有3500万人口的土耳其将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同化于拥有4亿居民的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共同市场将会形成新的十字军东征。^③这种思想在深受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冲击的中小资本所有者中间颇有市场,其反帝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话语对城市下层、边远农民以及出生于安那托利亚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很有吸引力。但是埃尔巴坎的思想仅仅是其创建和管理政党的理论探索,并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土耳其推行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强调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倡导“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等基本纲领;^④强调自由民主政治原则,主张建立多元法律,保证个人自由;建立基于公正秩序^⑤的第三条道路;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借助这些颇具煽动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繁荣党吸引了大批市场经济中的失利者,赢得1995年大选,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尽管繁荣党上台后并没有改变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军方仍然通过软政变迫使执政仅仅11个月的联合政府垮台,繁荣党遭到取缔。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全球化浪潮的高涨,继承繁荣党衣钵的美德党提出涵盖民主、人权、自由、法制和进步的政党纲领,并从反

① 1930年,麦哈迈德率领一群参加晨礼的群众离开清真寺聚集到伊兹密尔附近麦纳麦的一个广场上,高呼恢复沙里亚和哈里发制度。麦哈迈德是纳格什班底教团的成员,自称是马赫迪,当地的后备役军官、小学教师哈桑·库比拉等人被派去镇压和逮捕示威者,结果被麦哈迈德抓住并割下了头颅,两名干预此事的旁观者也惨遭杀害,这就是著名的麦纳麦事件。

② Binnaz Toprak,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Leiden: E.J.Brill, p.98.

③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the Role of Islam*, p.123.

④ 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⑤ 1991年,埃尔巴坎出版了《公正经济秩序》一书,公正秩序从此成为繁荣党的标志。公正秩序所设想的社会完全处于市场力量的控制之下,国家并不参与任何经济活动,所做的只是防止垄断,预防失业,增加出口,减少国家外债,降低通货膨胀。

对西方转向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从坚持伊斯兰经济模式转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美德党分化而来的正义与发展党试图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塑造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官方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以整合本土与普遍的价值、传统和现代、道德和理性。^①正义与发展党的纲领明确规定:“我们的政党旨在提供国家问题的原始的和永久的解决方案,与世界现实合拍,汇集过去和传统的内容,使公共服务成为其基本目的,在当代政治价值而非意识形态平台上实施政治活动。”^②这是正义与发展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的现实性选择,体现了伊斯兰政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突破狭隘与局限,趋于务实与开放。当然经济模式变革仅仅是促进伊斯兰主义者政治纲领转变的一个诱因,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导话语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生、高涨与转变与经济模式变革呈现同步的呼应态势。与凯末尔威权政治相对应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造成伊斯兰势力缺乏发展的经济空间,所以在共和人民党一党执政时期,土耳其伊斯兰势力处于蛰伏状态。随着土耳其由国家主义向进口替代经济模式过渡,伊斯兰政党成立并角逐国家政权,伊斯兰组织日趋活跃,伊斯兰经济团体发展迅速。随着土耳其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经济模式转变,伊斯兰政党、伊斯兰组织、伊斯兰经济团体逐渐转变主导话语,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说,经济模式变革对伊斯兰复兴产生重要影响,但经济转轨对社会影响程度的差别决定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其反弹程度的差异,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表现的重要原因。

经济模式变革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路径选择,既然是选择就伴随着试错与纠错的交替进行,这就意味着经济现代化过程伴随着动荡和稳定的交替进行。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它们出于捍卫新生民族国家独立和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选择

社会主义道路,大都选择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国家控制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核心资源和工业。在伊斯兰世界,这以伊朗、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为代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这些国家纷纷从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渐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但民族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增长过程的波动性、较迅速的城市化以及不断加剧的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在这个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增长速度的减慢、经济结构的滞后、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世界市场的波动等问题,那些未能从国家主义政策中得利的社会阶层便表现出对当局和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反抗,部分国家能够借助宗教或政治权威制止这种不满和反抗,而部分未能有效遏制这种不满的国家便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而且,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那些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群体渴望以自己的特有文化及政治身份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且它们凭借自身所保持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在下层民众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部分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伴随着伊斯兰主义者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和国家权力的争夺。不过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趋于平稳,自由市场经济逐渐趋于成熟,伊斯兰主义者作为经济变革过程中的获利者,逐渐改变极端立场,采取较为温和与务实的态度来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这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最具代表性。不过,只要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经济模式的变革过程中,由经济模式变革造成的社会矛盾就不会解决,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有存在

(转第36页)

^① Ahmet T. Kuru, "Reinterpretation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142.

^② Sultan Tepe, "A Pro-Islamic Party? Promise and Limits of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M. Hakan Yavuz 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urkey: Democracy and the Ak Parti*,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p.120.

“印象”难以完全改变。尼科利尼为塞尔维亚选择了“同时面向东西方”的外交政策,对其本人的定位是“民族主义者+民主人士”,这意味着他并未放弃其民族主义倾向及主张,还会引起他与西方及地区其他国家的摩擦,最近其关于“大塞尔维亚主义”与“斯雷布雷尼察”的言论及各方的反应便是一例。6月11日尼科利尼的就职典礼,仅有黑山总统菲利普·武亚诺维奇、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欧盟负责扩大事务委员史蒂芬·福勒等参加,地区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国领导人“予以抵制”。

其次是与未来政府的关系问题。塞尔维亚宪法规定,塞尔维亚是议会制国家,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最高行政机关,总统是国家的代表,权力有限。但是塔迪奇任总统期间,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其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总理、议长、副总理、司法部长、外长、国防部长、军队参谋长以及情报安全部门等各方负责人。^①该委员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与海牙法庭加强合作,抓捕战犯,后逐渐演变成审查并协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政、外交及军事政策。塔迪奇借助“国家安全委员会”操控权力,加之他本身又是民主党主席,所以其在位时权力很大,总理则更像经济部长。现在,尼科利奇出任总

统,人们不禁要问:他与未来政府的关系如何,其总统权力是否还能像塔迪奇在任时一样大,甚至是否会出现与罗马尼亚一样的总统与总理权力之争。

最后是重振塞尔维亚经济。塞尔维亚在前南时期属中等富裕的共和国,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前南地区接连发生战争,连年受到国际制裁,经济十分困难。产业现代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大部分处于20世纪80—90年代水平。在塞尔维亚出口产品中,仅有农产品具备一定竞争力,其他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常年逆差。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塞尔维亚经济严重衰退,产业效益总体下滑20%以上。目前,塞尔维亚的失业率接近25%,外债在今年年底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5%。^②虽然经济工作一向由政府负责,但是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下降会引发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会对尼科利奇执政前景构成困扰。◎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 “塞尔维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加强抓捕战犯嫌疑人”,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1/13/content_4045727.htm

^② “Crisis-torn Europe Making Belgrade Rethink EU Lust-Serbian President-elect”,
<http://www.rt.com/news/serbia-president-tomislav-nikolic-358/>

(接第6页)与发展的空间,所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仍然是当今世界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

当前,伊斯兰复兴运动已渗透到伊斯兰世界的主流社会,在许多国家表现为由既受过现代教育又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社会精英领导的群众性复兴运动,该运动的中坚力量已不是无产或最贫穷阶级,而是中产和下中产阶级。所以说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以中产和下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集政治、宗教、文化与经济为一体的社会民族主义运动,并非简单的纯宗教运动,也不是现代化进程中非理性的暂时倒退逆流,而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为穆斯林进入和适应现代化潮流奠定了经济基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穆斯林平等参与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以及以自己特有文化及政治身份平等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共同需求,这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政治变革之间的互动性关系。所以说,当一个国家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不仅应对该道路在经济上的弱点有所意识和准备,还应对其在文化意识上的内涵有所意识和准备,以实现经济与政治、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协调。尽管经济模式变革激发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生、发展、高涨和转化,不过就伊斯兰主义者的经济纲领和基本诉求来看,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市场经济的抗拒者。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纵深发展,融入世界市场和全球化潮流已成为诸多伊斯兰主义者的共识,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渐顺应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何桂全)